

读史忆人 典故

邓铁梅率部粉碎日伪“大讨伐”

九一八事变后，邓铁梅深感亡国之痛，前往辽东山区组织抗日队伍。同年10月下旬，他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，活动在丹东、凤城、岫岩、庄河一带。邓铁梅率部到处袭击日军，解救抗日爱国同胞，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斗志，吸引了大批抗日志士、进步学生参加到民众自卫军中来，作战人员很快发展到1.6万人。

1932年3月，邓铁梅把司令部移至尖山窑镇。不久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苗可秀等人到邓铁梅部，将邓部统编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军，任命邓铁梅为司令，苗可秀任总参谋。

东北民众自卫军的迅速发展使日伪当局惊恐不安。1932年12月，日军调集1.5万余人对东北民众自卫军进行“第一次大讨伐”。面对敌强我弱的局势，邓铁梅、苗可秀等率部进入大山、森林中与敌周旋。

日伪军500多人进入文家街村、尖山窑镇一带，准备继续“讨伐”这一带的民众自卫军。邓铁梅和苗可秀闻讯后，立即制订了反“讨伐”计划。

邓铁梅、苗可秀侦知日伪军的兵力部署后，于12月28日傍晚率部3000人隐蔽到文家街村外，悄悄占领了制高点。邓铁梅一声令下，民众自卫军的迫击炮、轻重机枪居高临下向敌人开火，压制村内敌人岗楼的火力。500多名日伪军仓皇迎战，以房屋为掩体拼命抵抗。夜间，埋伏在街外的大刀队手持大刀长矛冲进文家街村内，对敌人发起夜袭。战至天明，敌人不支，向文家街村后山的红花岭突围。自卫军战士奋力追赶，勇猛冲杀，毙敌50多人。天明后，残敌逃到红花岭上，才发现自卫军人数数倍于己，于是不敢恋战，急忙沿山路向尖山窑镇一带溃逃。邓铁梅立即指挥攻克文家街村，缴获了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。

在文家街、红花岭受到重创的日伪军溃退到尖山窑镇后，邓铁梅、苗可秀决定乘胜追击，收复尖山窑镇。12月30日深夜，自卫军秘密开到镇外，发起突然攻击。邓铁梅亲自督战，苗可秀率学生队冲锋在前。日伪军从睡梦中惊醒，仓促应战。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，民众自卫军于第二天拂晓突破了外围阵地，攻入镇内。敌人在此前文家街村的战斗中已将大批弹药遗弃，此刻又得不到补充，勉强支撑一阵后，便放弃阵地，向白旗堡逃窜。邓铁梅率部追击十余里，乘胜收复了尖山窑镇。

得到尖山窑镇胜利消息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各部，立即从山林中走出来，配合主力四处打击日伪军“讨伐”队。各处敌人无法立足，纷纷撤走，从12月13日起至1933年1月初，邓铁梅、苗可秀率部民众自卫军通过历时近一个月的作战，彻底粉碎了日伪的“大讨伐”。

(据《人民政协报》)

鲜为人知的皖西红二十七军

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曾有2支红二十七军，一支是1932年10月组建的皖西红二十七军，另一支是1935年1月组建的陕北红二十七军。本文所说的是皖西红二十七军。

1932年9月底，在红四方面军主力由湖北省英山县向黄安县(今红安县)转移途中，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致信给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，让他与东路游击司令员刘士奇、红九军第27师师长徐海东等组建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，统一领导鄂皖边界地区的工作和武装斗争。10月1日，中共皖西北道委在英山土门潭召开会议，根据中央分局指示，成立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，并决定将金家铺一带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统一编成红二十七军。

10月2日，中共鄂皖工委在金家铺的河滩上召开大会，正式宣告红二十七军成立，下辖第79、第81师，全军共4500余人，由刘士奇任军长、郭述申任政治委员。

首战趾凤河。红二十七军成立后，为避敌锋芒，向太湖县、宿松县方向前进。10月9日，在趾凤河以东栗树嘴、帅家垄，遭敌第46师2个团堵击。考虑到敌第46师战斗力较弱，红二十七军决定利用趾凤河一带有利地形集中全军力量歼灭敌军。徐海东率一营迂回到敌人侧后方，迅速攻占小石门制高点，切断敌人退路，给敌以重大杀伤。敌军顿时陷入一片混乱，红二十七军其他各团乘势发起猛烈攻击。激战至16时，毙伤俘敌约1个团，缴获大量枪支弹药。此战有效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，之后一段时间内，敌人不敢轻举妄动，为红二十七军转战赢得宝贵时间。

再战衙前镇。10月中旬，红二十七军经店前河、河图铺地区，到达潜山县衙前镇(今安徽省岳西县城)以东的一条山沟附近，遭敌第54师伏



红二十七军诞生地——湖北省英山县金家铺镇龙潭河村今貌。

击。部队和随行群众及伤病员都涌到山沟里，人多沟窄、行走困难，情况危急。红二十七军迅速抢占衙前镇东侧的几个山头，抗击数倍于己之敌，同时组织群众火速转移。经过3个多小时激战、10余次反复冲杀，最终打退敌人的进攻，毙伤俘敌数百人。

三战大沙河。衙前镇战斗后，红二十七军向北转移拟渡过沙河。10月24日，在官庄地区全歼敌第32师1个营。之后，红二十七军夜向桐城县土岭方向转移。在土岭冲破敌第32师的围堵后直插大沙河。渡河后，红二十七军第1团随即占据河东有利地形，与尾随而来的敌军隔河展开激烈战斗。敌人仗仗数量上的优势，企图强渡大沙河。第1团顽强阻击敌人，打退敌人多次进攻，粉碎了敌人的渡河企图。

突围磨子潭。11月初，红二十七军到达霍山县三里店村后，中共鄂皖工

委召开军领导干部会议。会议认为，红二十七军远离根据地，缺衣少粮，部队天无行军作战，兵员补充和伤病员安置都有困难，于是决定渡过沙河，返回皖西北革命根据地。

11月6日晨，红二十七军到达沙河东岸磨子潭附近。敌第32师第94旅已占据河西岸的大小山头，控制了黑虎尖制高点，堵住了红二十七军去路。敌第47师也跟踪而至，占领了红二十七军路上的两侧山头，切断了红二十七军的退路。红二十七军被压缩至河川峡谷里，情况异常危急。刘士奇当即决定突出重围，并把这一任务交给第79师第1团。在徐海东的率领下，第1团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，强渡沙河，向敌人黑虎尖阵地发起攻击，用刺刀和手榴弹杀出一条血路。由于敌人火力凶猛，刚打开的突破口很快被封锁，徐海东迅速带领突击队再次攻击。同时，第79师第3团团程启

波也率突击队，从敌侧翼设防薄弱的几丈高的陡壁攀登上去，突然杀向敌人，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。我军后续部队和地方干部、群众及伤病员乘势突出包围。此战，红二十七军毙伤敌数百人。

激战吴家店。11月14日，红二十七军到达皖西北革命根据地边缘的金寨吴家店地区。翌日，敌第32师和第47师尾追而来。全军下定决心，绝不让敌人进入根据地危害群众。遂在吴家店以东包畈河北岸占领有利地形，成一线展开，顽强阻击敌人。敌人出动飞机38架次，狂轰滥炸，掩护其地面部队进攻。经3昼夜激战，红二十七军打退了数倍于己之敌的多次冲击，毙伤俘敌近千人。

决战沙窝集。此后，红二十七军在赴鄂东北的途中，于商城县新店子(今商城县达权镇新店村)夜袭顾敬之的反动民团，毙伤敌200余人。在沙窝集时，敌第75师1个旅从商城县余集镇追来。红二十七军集中全部兵力占领有利地形，经激烈战斗，将敌击溃，歼其1个营，从而顺利进入鄂东北革命根据地。

11月24日，红二十七军到达黄安县七里坪附近，与中共鄂豫皖省委和鄂东北地区的红军会合。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斗争形势需要，决定撤销中共鄂皖工委，并撤销红二十七军番号，下辖两个师分别编入红25军和红28军。虽然红二十七军仅存54天，但在中共鄂皖工委领导下，转战10余县，行程近3000公里，钳制了敌人5个师以上兵力，经历大小战斗数十次，打垮了敌人多次追堵，歼敌近4000人，保存了可贵的革命种子，为皖西北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作出贡献，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光辉一页。

(据《学习时报》)

拾遗

粟裕赞咖啡厅视角独特

据开国大将粟裕的夫人楚青晚年回忆，上海解放后，她曾和粟裕(时任上海市军管会副主任)难得地逛了一次南京路。当时他俩正走着，突然粟裕盯着一家咖啡厅说：“这里不错呀！”

楚青非常意外，粟裕在她眼里可不是个讲情调的人，于是就问他为什么。结果粟裕说：“如果在这家咖啡厅的楼上架几挺机枪，就能守住整条街道。”

(据《天津日报》)

汪曾祺的“不随和”

汪曾祺先生是老辈文人，身上有一种名士气质，而名士气质的另一种解释，就是“不随和”。的确，圈儿里的一些老人谈起对汪曾祺的印象时，也认为汪老有些让人琢磨不透，在某些应该敷衍应酬的场合，他坚决不敷衍、不应酬。那么，汪曾祺是怎样的不随和呢？作家叶兆言与汪老打过多年交道，他曾在书中提供了两则汪老不随和的资料。

没想到有人不喜欢这种场面？叶兆言就不喜欢这种场面，他说：“其实就算是唱得好，也真不应该在饭桌前唱。吃饭就吃饭，干嘛弄得那么花哨。”

还有一件事，叶兆言是这样讲的：“在我的印象中，并没有见到多少汪曾祺的不随和。只有一次，参观一个水利枢纽展览，一位领导同志亲自主讲，天花乱坠地作起报告来，从头到尾，汪曾祺都没有正眼瞧那人一眼。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，以后遇到类似的场合，忍不住便想模仿。”

汪曾祺的这次“不随和”，是针对某些官场习气的，面对那个夸夸其谈的官僚，他报之以最高的轻蔑——连眼珠都不转过去，这是文人嶙峋风骨的体现吗？

由此看来，汪曾祺的某些“不随和”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他在某些事情上不违心顺从大家，虽然有些扫大家的兴，但这却是他真情实感的流露，如此坦白心迹的率真，应该获得理解和尊重。(据《联谊报》)

金庸独特的“字条管理法”

金庸于1959年和同学在香港创办了《明报》，从那时起，虽然掌控《明报》34年，但金庸的管理却始终“无为而治”。他从不召开员工会议，而是采取独特的“字条管理法”，若发现某位编辑出现诸如题目词不达意，文章中有错别字，标点符号使用不当等问题，“金氏纸条”就会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这个

编辑的办公桌上，每张字条都是浅显易懂，言简意赅。

每当收到金庸的字条时，编辑们虽然都格外紧张，但对金庸的“火眼金睛”却是钦佩有加，所以平时工作时都特别用心，不敢有丝毫懈怠，生怕自己冷不丁收到这样一张字条。

(据《天津日报》)



正月十五话“元宵”

元宵之夜，大街小巷张灯结彩，人们赏灯、猜灯谜、吃元宵，成为中国世代沿袭的传统习俗。元宵节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，又称“灯节”“上元节”“元夕”。在汉文帝时期，已下令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。汉武帝时，“太一神”(主宰宇宙一切之神)的祭祀活动也定在正月十五。司马迁创建“太初历”时，就已将元宵节确定为重大节日。就节期长短而言，汉代一天，唐代三天，宋代则长达五天，明代更是自初八点灯，一直到正月十七的夜里才落灯，整整十天。至清代，又增加了舞龙、舞狮、跑旱船、踩高跷、扭秧歌等“百戏”内容，只是节期缩短为四到五天。

“元宵”作为节令食品，始于东晋，盛于唐宋。最早关于元宵节吃元宵的文献记载出现于宋代。当时每逢正月十五人们必吃元宵，在典籍《平园续稿》《大明一统赋》《岁时广记》中均有记载。对元宵的称谓也有很多，比如“浮圆子”“乳糖圆子”，也称“圆子”“糖元”。如今，元宵在北方又称“元宝”“圆宵”，在南方则称“汤圆”或“圆子”“汤团”。圆圆的元宵承载着人们祈求团团圆圆、和美甜蜜的美好心愿。

元宵节之所以被称为上元节，也有着来历。据《岁时杂记》载，道教曾把一年中的正月十五称为上元节，七月十五为中元节，十月十五为下元节，合称“三元”。汉末道教的重要派别五斗米道崇奉的神为天官、地官、水官，说天官赐福、地官赦罪、水官解厄，并以三元配三官，说上元天官正月十五日生，中元地官七月十五日生，下元水官十月十五日生。这样，正月十五日被称为上元节。因此，南宋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中说：“正月十五日元宵节，乃上元天官赐福之辰。”

元宵节在古时也颇受女子的欢迎。因为在古代的大家闺秀，平日是不许踏出闺门的。只有元宵节前后三天，“妇女出游街巷，自夜达旦，男女混淆”，才可不分男女，一同玩乐、赏灯。张灯结彩的元宵灯会，成为古人相见相会的最佳节日，这也为青年男女打开了爱情的门，称为“元宵弛禁”。电视剧《大明宫词》中的太平公主，正是在14

岁的豆蔻年华，在浪漫的元宵之夜，遇见了意中人薛绍。

欧阳修脍炙人口的名篇《生查子·元夕》，则讲述了元宵怀念旧情的伤感故事。“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今年元夜时，月与灯依旧。不见去年人，泪湿青衫袖。”

而辛弃疾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更是描绘出元宵佳节火树银花的热闹场景：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。”也留下了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的浪漫温情。

近代流行的一个传说，将“元宵”改名为“汤圆”，说是与窃国大盗袁世凯有关。1912年2月，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，1915年12月复辟称帝。其时北京城内多卖桂花元宵。因“元宵”与“袁消”同音，袁世凯颇为忌讳，于是在1916年元旦袁世凯正式登基为“洪宪皇帝”前，北京警厅通令全市卖元宵者改“元宵”为“汤圆”，同时又下令把“元宵节”正名为“上元节”。不久，袁世凯又觉得“汤圆”也不好，汤圆的“圆”还是“袁”的谐音，煮汤圆吃也成了拿开水煮袁世凯，又改称“汤团”。但只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，在一片谩骂讨伐声中被迫取消帝制，接着在忧惧中不治而亡。时人因袁世凯取消“元宵”，流传一些儿歌和诗加以讽刺：“袁总统，立洪宪，正月十五称上元；大总统，真圣贤，大头抵铜角，



国画《闹元宵》。

元宵改汤圆。”“大总统，洪宪年，正月十五吃汤圆。汤圆、元宵一个娘，洪宪皇帝命不长。”“诗吟圆了溯前朝，蒸化熟时水上漂；洪宪当年传禁令，沿街不许喊元宵。”

但有板有眼的此说并无史实依据。袁世凯三女袁静雪在《我的父亲袁世凯》中回忆道，袁世凯称帝之前，家中为立“太子”“妃”“嫔”事，闹得不可开交。1916年元宵节晚上，由六姨太发难，又闹了一场。其时，家人正聚于居仁堂下等着吃元宵。“父亲和我们家里人都依然把汤圆叫元宵。有人把

外间叫汤圆的说法告诉了我父亲。他还说：‘袁、元两字，音同字不同。有什么可忌讳的。’由此可见，“汤圆”之称，是起于民间的，所谓袁世凯“下令”将元宵改名汤圆，并没有事实根据。

“今岁元宵明月好。”岁月变迁，元宵节延续的古老风俗依然，都寓意阖家团圆、生活美满，寄托新的一年幸福安康、诸事圆满的美好心愿。元宵节传统文化的元素，始终是人们心中割舍不断的情愫。

(据《联谊报》)